

## 中國式天主教建築在戰前香港的發展探析（1922-1941）

黃懿綦<sup>1</sup>

[摘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對宗教藝術本地化的指示下，揉合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教堂在神州各處零星地建立起來，香港天主教會卻似乎聞風不動：這個時期興建的九龍太子道聖德肋撒堂，因葡籍教友反對而捨棄了中國式設計；選址於港島南部的華南總修院，乃香江首座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建築，但由於資金不足只建成了三分之一。本文搜集了教會內外的資料，在第一部分首先敘述中國式天主教建築出現的歷史背景，1922年赴任的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及建築師葛斯尼對中西建築融合的倡議；第二部分是對上述兩座建築的研究，並從香港獨特的歷史與景觀，教會財政及教徒需求等方面，探討直至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以前，教會本地化進程未有呈現於建築藝術上的原因；最後，第三部分略述四十年代末以降，香港天主教會因應難民潮而加強社會角色，新建的教堂著重於功能性，到梵二禮儀改革後有些教堂的設計再次融入中國元素以落實本地化精神。

**關鍵詞：**教會本地化、剛恆毅、天主教建築、聖教藝術、華南總修院、聖德肋撒堂

---

<sup>1</sup>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

## 引言

充滿中國傳統建築元素的華南總修院（今香港教區聖神修院），八十五年來矗立於香港仔一座三面環海的小山之巔。這座香港罕有的融合中西建築特色的天主教建築，是中國教會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嘗試推行建築藝術本地化以發揚其大公特徵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當中唯一至今依然由教會運作的建築物<sup>2</sup>。本文以華南總修院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整理現存於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的信函及其他相關書籍資料，敘述修院的籌建過程、最初設計的構思及其後遇到的困難。有趣的是，據建築師自己的解釋，總修院是模仿中國城牆和角樓的「山巒式」建築，而非普遍以為的四合院式。然後，本文簡述同時代未能實現中國式設計的聖德肋撒堂的興建過程作對比，從而檢視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 1922-1933在任）推動天主教本地化的使命在香港獲得怎樣的回應，並分析背後的原因。毫無疑問，教會的建築形式與傳教策略跟隨著時代的需要而變遷，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禮儀憲章》（1963年頒布）提倡聖教藝術要採納各民族的特性後，我們不難在香港一些天主堂發現中國藝術元素的蹤影。

## 中國式教會建築出現的歷史舞台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打開大清帝國百年禁教的大門後，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西方傳教士蜂擁入華，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傘下到各通商口岸以至內地傳教，在修建教堂方面，他們傾向將本國的建築風

---

<sup>2</sup> 此處專指大型教會建築，其他現存的建築物如河北宣化城外的主徒會會院（1927年）、北平時期的輔仁大學校舍（1930年）及開封東郊的河南總修院（1930年），均已停辦或由非教會機構接管。教堂等小型建築因具體資料不詳難以論斷。

格移植到中國土地上。由於中國人只視建築為一種生活的器具和工匠的營造技術，在近代中西建築文化交匯的初期，西方建築形式的輸入縱然帶著一種顯示和炫耀西方文化的優越姿態，卻沒有遇到多大的障礙，甚至成為皇帝和趨洋求新的中國人爭相模仿的對象。

然而，隨著民眾的排外情緒日益高漲，具有基督宗教文化表象特徵的哥德式或巴洛克式教會建築物，在晚清的歷次教案尤其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教內稱為庚子教難）中屢屢遭受破壞或焚毀，眾多西方傳教士及中國教徒遇難，損失十分慘重<sup>3</sup>。經歷腥風血雨後，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紀初的二十年裡，迎來了相對平靜而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傳教士為博得中國民眾的好感和認同，更重視拓展教育、醫療及慈善事業，受洗人數有大幅增長。<sup>4</sup>

華北各地的教堂憑藉庚子賠款重建起來，但是仍然採用西方建築風格<sup>5</sup>，只有基督教創辦的幾所高等學府，開始在個別熱愛東方藝術的外籍傳教士的嘗試下，校舍採用中西結合的形式，作為一種建築文化策略<sup>6</sup>。據廣州大學董黎教授的研究，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大學中西

---

<sup>3</sup> 據統計，義和團運動期間，基督教共有 136 名外籍宣教士、53 名子女、約 2,000 名中國教徒遇害，天主教有 47 名神職人員和修女、約 30,000 中國教徒被殺，俄國東正教徒有 200 人死亡。至於教堂方面，僅以天主教直隸東南代牧區（今河北省獻縣教區）為例，其 674 座教堂之中逾九成毀於庚子教難。參見〈獻縣教區簡史〉，獻縣教區網站 <<http://www.xianxiancc.org/showart.asp?id=2>>，取用日期：2016 年 9 月 15 日。

<sup>4</sup> 再以直隸東南代牧區為例，在義和團運動前有 50,575 名教徒，教難期間有 5,153 人遇害。翌年新主教上任，立即決定開辦中學，恢復診所，成立女修會及公教進行會等，推行傳教工作。10 年內增加新教友 34,024 人，到「五四運動」前夕教徒人數已突破十萬大關。參見〈獻縣教區簡史〉。

<sup>5</sup> 例如北京的宣武門天主堂（巴洛克式建築，1904 年重建）和王府井天主堂（羅曼式建築，1904 年重建）。

<sup>6</sup> 比較典型的例子有上海聖約翰大學（1905 年）、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0 年）、南京金陵大學（1911 年）、廣州嶺南大學（1916 年）等。

合璧風格來自傳教士自己的願望和理解，然後邀請西方建築師來設計，並沒有一致的建築形式：

對於西方建築師來說，這是一次各顯神通的時機，一次富有東方情調的嘗試，一個多元並存的過渡階段，一個法無定式的探索年代。其結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國式大屋頂的特徵之外，其餘部分就很難有共通之處。即使是屋頂，西方建築師在處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異。<sup>7</sup>

由於受到政治、經濟和技術等客觀因素制約，早期的基督教大學校舍沒有形成一種成熟的建築風格，缺乏相應的一貫性、獨特性和穩定性，因此影響也較小<sup>8</sup>。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據為己有，其後在巴黎和會上獲得列強承認，觸發1919年北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三年後，文化批判演變成一場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的全國政治運動——「非基督教運動」（1922-1927）<sup>9</sup>，促使教會在「反帝愛國」浪潮中作出改革，推行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sup>10</sup>，其目的是

---

<sup>7</sup> 董黎，《中國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頁 185。

<sup>8</sup> 同上，頁 37。

<sup>9</sup> 據上海大學陶飛亞教授的研究，「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陶飛亞，〈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頁 122。不過，從當時教會人士的回應來看，不論西方傳教士或華人教會領袖均對此運動背後的有組織的計劃，以及其與共產黨的關係似乎未有察覺。參見趙天恩編，《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1983），頁 54。

<sup>10</sup> 「本色化」（Indigenization）是基督宗教在異文化中傳播的一種策略，目的是使基督信仰融入本地文化環境，以本地文化重新詮釋信仰，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會；其近義詞有「本土化／本地化」（inculturation）及「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

「一方面求使中國信徒擔負責任，一方面發揚東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醜名」<sup>11</sup>。

於是，教會建築形式在此趨勢下也融合中國式大屋頂等元素，比較著名的建築師有美國人墨菲（Henry K. Murphy, 1877-1954），他除了設計燕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沙雅禮大學，並於1929年受聘為南京首都計劃建築顧問，翌年擔任上海市政府圖案競賽的評判顧問。在他個人的實踐及指導中國建築師如呂彥直和董大酉之下，推動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復興<sup>12</sup>，他們以清代官式建築風格為藍本，用鋼筋混凝土材料創造了新的建築風格。這種原來由西方傳教士提倡的中西合璧式建築，更在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提倡文化本位主義下，被指定為政府及公共建築物的官方範式，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出現一個興建中國復古建築形式的高潮。<sup>13</sup>

### 剛恆毅來華推動教會建築本地化

當非基督教運動與教會本色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天主教方面的本地化進程也隨著第一任宗座代表從羅馬悄然來到中國而起步，並

---

<sup>11</sup> 摘自第二次基督教全國大會的《教會的宣言》。1922年5月2日至11日在上海市政廳召開的這場大會，決議倡導「本色教會運動」。參見董黎，《中國教會大學建築研究》，頁193。

<sup>12</sup> 賴德霖，《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頁195-196。

<sup>13</sup> 這種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復古建築形式被稱為「中國古典復興式」（賴德霖）或「中國文藝復興式」（徐敬直），而國民政府將該範式命名為「中國固有式」；本文為了簡潔起見，使用「中西合璧」及「復古」等形容詞描述之。建築實例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和廣州，包括行政、會堂、文教和紀念性建築，如南京中山陵（1931年）、廣州中山紀念堂（1931年）、上海市政府大樓（1933年）、圖書館和博物館（1935年）等，甚至影響到體育館、醫院和商業建築。參見鄒德儂，《中國現代建築史》（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頁46。

促成了教會建築形式的改革。事實上，在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年間，天主教的傳教策略仍然傾向傳統保守，並沒有因義和團運動的衝擊而發生多大變化，甚至普遍地存在以金錢收買教徒的情況，而不是以適應中國文化的傳教方法去吸引人信教。<sup>14</sup>

意大利籍剛恆毅總主教於1922年8月9日獲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XI, 1922-1939年在位）委任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他按照教廷傳信部部長的指示，為了避免當時擁有天主教保教權的法國干預，於同年11月8日抵達香港後，才公開聲明其宗座代表身份。剛恆毅本身是雕刻家，履任後仔細地考察了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的歷史，勘察各教區從城市到鄉村的教會建築物。剛恆毅本身是雕刻家，履任後仔細地考察了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的歷史，勘察各教區從城市到鄉村的教會建築物。而他對中國本土宗教藝術的倡議，最早見於他從漢口移節北京之前，於1923年3月18日答覆奉獻公署的北京教友的信函。他除了要求公署的設置「須擯除一切之妄費，及種種世俗奢侈」，還有：

其建築及修飾須完全依中國形式，余之欲此有二故焉。一乃美術之觀念，蓋各國各有其建築之規模。近來每見修蓋房屋，必以取法洋式為美觀。余以為是誠一大錯謬。再者，聖教會乃普世各國之公教，即以技藝論，普世各處之藝能，彼皆一一吸取之，而以普世之美好，獻與天主。<sup>15</sup>

---

<sup>14</sup> 參見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22。

<sup>15</sup> 《聖教雜誌》，1923年第5期，頁230。

一個月後（4月23日）他致函兩位監牧<sup>16</sup>，表達對他們在當地興建新教堂的四點提議：「一、西方藝術用在中國屬於形式的錯誤，教會絕不像羅馬帝國企圖以武力或權勢來征服人；二、將外國建築式樣帶入中國，就傳教方法來說頗不適宜，不要使中國人在教堂裡，感到是在洋房裡，而宜使他們覺得確實是在自己的家裡一樣；三、教會之傳統是就地取材，以高度的智慧運用各個時代與地區的藝術興建聖堂；四、不能說中國建築術不適宜建造聖堂，要學習中國建築與美術的精華，用以表現出天主教的思想。」不過在第四點中，他反對盲目照搬中國傳統建築形式：「吾人當鑽研中國建築術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產生新面目。絕不是抄襲廟宇的形式或拼湊些不倫不類的中國因素而已。」<sup>17</sup>

剛恆毅任內最重要的舉措之一，是1924年召開「全國主教公會會議」<sup>18</sup>，其決議案的各項指示中包括宗教藝術，要求主教們「起造教堂所用建築及裝飾物以及神父住宅等，不可一味採用外來藝術，得因時地之宜，盡可能採用中國藝術樣式」（第453項）<sup>19</sup>。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

<sup>16</sup> 兩位監牧是廣東江門的華理柱（James E. Walsh, MM, 1891-1981）和湖北漢陽的高爾文（Edward J. Galvin, SSC, 1882-1956）。

<sup>17</sup> 參見剛恆毅著，孫茂學譯，〈天主教藝術在中國（二）〉，《中國天主教美術》（台北：光啟出版社，1968），頁21-24。在同一年，他就傳教藝術的問題撰寫了一份報告書，提出相同的主張：一、在中國，西方藝術是一種錯誤不適宜的風格；二、外來的藝術，只能助長那種已極普遍的成見，以為天主教是一種洋教；三、宗教藝術的偉大傳統教訓我們，應採納當地的各種不同的風格；四、中國的藝術很美，可以多方加以利用。參見剛恆毅，〈傳教區的新藝術〉，《維護宗教藝術》（台北：天主教主徒會，1977），頁163。

<sup>18</sup> 此會議又稱為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由剛恆毅擔任主席，與會者共有來自全國五大傳教區的主教43位、監牧5位、監理1位及司鐸40多位，包括各修會的省長和會長等，其中2位監牧和7位司鐸是中國籍。公會議由1924年5月15日開幕，至6月12日閉幕，典禮在上海徐家匯大堂舉行，全體會議地點在洋徑濱天主堂大廳。參見《聖教雜誌》中華全國主教公會專號，1924年第7期，頁19-24；林瑞琪，〈剛恆毅與一九二四年上海會議的國籍教長〉，《鼎》，2008年春季號，第28卷，第148期，頁23-38。

<sup>19</sup> 剛恆毅著，孫茂學譯，〈天主教藝術在中國（一）〉，《中國天主教美術》，頁12。

宗教研究所劉國鵬的研究顯示，在1924年6月30日寫給傳信部的報告中<sup>20</sup>，剛恆毅提及決議案的草案第一卷中原來有他所提出的支持中國本土教會建築的提議，被拒絕後「在措詞上稍事修改，將之重新納入草案第三卷，從而獲得通過」。起初的草案條文我們如今無法得知，但可以推想決議案中使用「因時地之宜」和「盡可能」等比較溫和的字眼，有助於與會者消弭分歧。有關修改也反映了至少有部分中國教會領袖並不苟同宗座代表的觀點。

### 葛斯尼對中西建築融合的見解

在決議案通過後，剛恆毅進一步將其對教會建築必須結合中國藝術風格的理念付諸實踐。1925年，他邀請在意大利卡西諾山本篤會修院（Montecassino Abbey）認識的荷蘭籍建築師葛斯尼神父（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 1877-1965）來中國從事設計。葛斯尼研究中國建築藝術後<sup>21</sup>，指出中國廟堂建築的三個主要部分與西方建築是「不相為謀」的：首先，中國人重視台基，大型建築物甚至藉著圍欄和台階增加台基的重要性，而西歐通常把台基隱蔽起來，或至少置於次要地位；第二，中國建築物的主體是向橫伸展的長方形，使人產生平安與恬靜的感覺，而西方哥德式教堂則向上伸高；第三，中國人認為屋頂有遮風避雨的作

---

<sup>20</sup> 現存梵蒂岡前傳信部檔案館：Protocollo 2661/1924, APF, N.S., vol.806。參見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頁168。

<sup>21</sup> 葛斯尼對中國建築藝術的鑽研心得見於〈中國建築術〉（Chinese Architecture）一文，最早刊登於輔仁大學的 Bulletin 第4期（1928年5月），頁33-45，原文為哪一種語文不詳；筆者找到《公教教育叢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的1928年9月號，以及1932年5月 L'Art Chrétien Chinois 專號，先後轉載了英文版（頁258-266）與法文版（頁418-437）。本文引用孫茂學翻譯之中文版，收錄於《中國天主教美術》，頁33-41。



用，傾向把屋頂部分建得較大，或分成數層並加以裝飾，而在西方人眼中牆才有保護作用，故屋頂的面積較小，甚至被遮蔽起來。<sup>22</sup>

縱然中西建築的形制不同，葛斯尼仍然堅信「在藝術的風格上，要滿足中國人的欲望，採用中國的形式與規格，來建造我們的天主堂」。他就「兩個比較嚴重的異議」作出回應，第一是中國式建築工程費用浩大，他建議運用現代建築術，以鋼筋混凝土來代替昂貴的木材，「不但經濟，而且還有耐久與防火之好處」；第二是中國廟宇形式不適合舉行天主教禮儀，他認為由於中國建築物的正面橫寬而不向深度發展，教堂因而改變為橫向布局，把祭台置於廳堂的中央，「縮短了神父與教友間的距離，而得以協調一致」。<sup>23</sup>

葛斯尼在短時間內設計了十多座中國式天主教建築，包括北平輔仁大學、香港與開封的總修院、宣化主徒會教堂，以及河北安國、江蘇海門等地的教堂。董黎評價葛斯尼說，他「大約是第一位用專業術語來褒揚中國建築術魅力的傳教士」<sup>24</sup>；並認為，在中西文化的交匯與融合方面，葛斯尼的認識和實踐是非常有意義的，即使僅僅從建築學的角度而言，其設計也是非常具有創造性<sup>25</sup>。而剛恆毅對協助他實現理念的葛斯尼嘉許說：

葛斯尼神父別具匠心的建築，雖然應用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因素，  
但同時也灌輸進一種新精神——天主教精神——由之，簡直可說凡

---

<sup>22</sup> 葛斯尼，〈中國建築術〉，頁 37-38。

<sup>23</sup> 葛斯尼又寫道，實際上歐洲已有些人發起運動，批評哥德式教堂的祭台離教友太遠，提倡要剷除這種不便。葛斯尼，〈中國建築術〉，頁 40。

<sup>24</sup> 董黎，《嶺南近代教會建築》，頁 134-135。

<sup>25</sup> 同上，頁 139。

他建造的東西無不著手成春，充滿活力。葛斯尼神父設計的建築完全吻合中國的風味，絕沒有掘古抄襲的劣跡；實堪稱「藝術的復興運動」沸騰著真藝術的生氣。<sup>26</sup>

### 開埠初期的香港天主教堂

天主教傳入香港始於英軍1841年2月宣布佔領香港的兩個月後，教廷傳信部頒下法令，指示「為了天主教士兵及教友的精神需要，同時為了傳教」，將「香港島及其周圍六里地方」從澳門教區分離，成為一個新的監牧區，直屬傳信部，委任傳信部駐澳門代表若瑟神父（Theodore Joset）為首任宗座監牧。<sup>27</sup>

維多利亞式建築物由開埠初期起，逐漸佈滿香港島北部及1860年被割讓的九龍半島。自然由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興建的天主教堂也都是歐洲建築形式，尤其具有當時流行的哥德復興式風格，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1888年）、花園道聖若瑟堂（1871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伯大尼修院小堂（1875年）和尖沙咀玫瑰堂（1905年）；至於在新界地區如大埔及西貢，傳教士傾向建造簡單的小型鄉村教堂。據九州大學藝術工學研究院福島綾子的研究，自香港宗座監牧區於1841年設立以來，所有建築工程諸如在何地、如何興建、修復、重建教堂，以及籌措有關經費，均由羅馬傳信部設於香港的總務處（Procura）決定。<sup>28</sup>

---

<sup>26</sup> 剛恆毅，〈天主教藝術在中國（一）〉，頁13。

<sup>27</sup> 田英傑編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頁1-3。

<sup>28</sup> Fukushima, Ayako. "Catholic laity involvement in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urch building projects in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from the 1960s to present."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Science*, No.667 (September 2011), p.1712.

## 香港首座中國式天主教建築——華南總修院

中西合璧的華南總修院（圖一）在建築形式上異於大部分香港的天主教建築，我們不難發現，它的輪廓相似同樣由葛斯尼設計的北平輔仁大學。建立總修院的目標是為華南地區的教會培育本地神職人員，這正是剛恆毅來華的其中一項任務，並寫進了1924年上海公議會的決議案當中<sup>29</sup>。1926年，他與華南各代牧及監牧商議後，認為香港最適合建立地區性修院<sup>30</sup>。他更特地來港尋找合適的地點，經過幾次出動物色地點不果後，終於偕香港代牧恩理覺主教（Enrico Valtorta）到了香港仔，在小舟上看到一座「幽雅秀麗而伸入大海懷抱裡的小山」，便登山視察，選定山上十萬平方英尺的地皮為修院地址<sup>31</sup>。據記載，「總主教很滿意此座山，因為它是突出海中的小山尖，環境清幽，風景秀麗，海水常從三面合，野花不斷四時開」。<sup>32</sup>

---

<sup>29</sup> 該決議提出在全國建立 14 所總修院。至 1936 年，包括華南總修院在內的 11 所總修院先後成立。林瑞琪，〈華南總修院在福音傳播中的角色〉，《近代天主教在華傳播史論集》（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12），頁 153。

<sup>30</sup> 剛恆毅 1926 年 6 月 16 日寫信給傳信部部長王老松（W. M. van Rossum, 1854-1932）樞機說，華南總修院選址於香港，是因為港督「願意為修院地皮及其他有關事項，提供一切便利」，而且相對當時中國大陸動盪的局勢而言，「無論香港會發生甚麼政治或經濟危機，香港仍會受英國管轄，所以是相當安全的，也是接觸各華南代牧區的方便途徑」（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16）。根據聖神研究中心林瑞琪的訪談校友陳子殷神父（1925-）所得，假如總修院設立於內陸，只有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牧養的廣州代牧區具備條件，因此選擇香港的另一原因是避免修院受制於法國政府。（林瑞琪，〈華南總修院在福音傳播中的角色〉，頁 158。）

<sup>31</sup> 鍾定舟，〈剛恆毅樞機與華南總修院〉，《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銀慶特刊）（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 100。

<sup>32</sup> 卓正賢，〈華南總修院史略〉，《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頁 8。

從剛恆毅其後與恩理覺的來往信函可見，他非常渴望總修院早日興工，除了寫信催促恩主教<sup>33</sup>，還親自致函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925-1930在任）對售地文件遲遲未能簽定表達關注，並解釋中國當前局勢不穩使在香港開辦總修院的事宜刻不容緩<sup>34</sup>。另一方面，他委託葛斯尼為修院進行規劃，於1927年10月11日將設計圖寄往香港，他有信心地寫道：「這是把中國藝術配合天主教建築物的第一個出色例子；為了用事實結束爭辯，它必需是出色的。基督教人士已在北京興建了一些宏偉美觀的大學建築物；不過，我們的建築似乎更精美。」<sup>35</sup>

葛斯尼1928年8月28日從北平寄給恩主教長達五頁的意大利文信件，闡述了總修院的構思與布局。剛恆毅委託他設計的修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期容納80名學生，待其餘兩個部分完成後，足以錄取共200名學生。第一期計劃包括兩座角樓，以及過渡到中間主樓的兩座副樓。每座角樓的底層面積為321平方米，內部格局為：第一層，一邊作臨時的小聖堂與聖器室，另一邊是學生膳堂；第二層，在小聖堂上方是三個教室，學生膳堂上面是大型自修室；第三層是宿舍，兩邊各有40個床位；宿舍上方的閣樓可以用作學生的康樂室和更衣室。每一層的所有房間都要有充足的光線和空氣流通。

---

<sup>33</sup> 恩理覺 1927年5月8日寫信給政府工務處主任 H.T. Creasy 表示：「從去年開始我一直處於窘境，你可以想像一個被宗座代表和華南五省的主教不斷騷擾的可憐主教有多麼煩惱，宗座代表不停地督促我進行這個計劃。」此信件及本部分引用的其他信件，除非特別註明，全部現存香港教區檔案處，HKCDA V-50-01。

<sup>34</sup> 剛恆毅致金文泰的英文信函日期為 1927年11月23日。該小山原是深灣墳場，政府必須等到第二年清明節之後起墳工程完成才能把地皮正式售予香港代牧區。

<sup>35</sup> 信函的日期為 1927年10月11日。引用自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18。

至於副樓，第一層一邊是教授膳堂，另一邊是神父廁所與浴室，其餘樓層用作樓梯、洗手台、學生廁所和浴室。主樓只有兩層，第一層有九個房間，當中五至六個供教授們使用，其餘為客房、會客廳和辦公室；第二層同樣是九個房間，可以按需要作不同用途，例如設置更多教室或自修室，也可以將兩、三個房間合併，拆除分隔的牆壁，作為圖書室或教授會議室等<sup>36</sup>。以下是筆者嘗試根據葛斯尼的文字描述製作總修院第一期的格局示意圖：

	角樓	副樓		副樓	角樓	
閣樓	康樂室 更衣室	樓梯  洗手台  學生廁所與浴室	主樓	樓梯	康樂室 更衣室	
第三層 2/F	宿舍 (床位x 40)			洗手台	宿舍 (床位x 40)	
第二層 1/F	教室x 3			房間x 9 (可合併)： 教室、自修室、圖書室、會議室	學生廁所與 浴室	自修室
第一層 G/F	小聖堂 聖器室			房間x 9： 教授研究室、客房、會客廳、辦公室	教授膳堂	學生膳堂

葛斯尼寫道，當整座建築物的三個部分全部落成，將有更充裕的空間作禮堂、康樂設施、圖書館、醫務室等，符合現代教育機構的建築規格。他還答覆一些異議，包括總修院的建築風格不是純中國式（清式），那需要很多空間且成本高昂，而是「山巒式」（massif style），即在山東、山西和河南等地常見的城牆與角樓的形式，其好處是使用較少木材，除了主樓第二層的走廊有九根柱子和欄杆是木造外，整座建築物可

<sup>36</sup> 葛斯尼在信中未有註明主樓與副樓的面積。

以用磚塊建成。他強調，這種「山巒式」風格絕對比歐洲式建築簡單。唯一裝飾較多和造價較高的部分是圍繞著角樓第一層窗戶上方的陽臺，不過它們是磚造的，設計也是最簡單的。至於支撐陽臺的樑托和屋頂可以使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屋頂向上彎曲的飛簷是中國式建築的主要特徵，可能花費稍多，但只限於角樓，他強調飛簷和陽臺是在有限經費下最基本的中國特色。

包括聖神修院網站<sup>37</sup>及教會內外一些書籍文章在內，往往描述修院原來的設計為「四合院式」建築。不過，相關字眼並沒有出現在葛斯尼的說明，或1927至1929年間剛恆毅與恩理覺的來往書信之中。由於找不到當初的設計圖，而且葛斯尼未有交代其餘兩個部分的形狀，華南總修院的完整布局究竟是「口」或「匚」形我們不得而知。

葛斯尼因在北平監督輔仁大學的工程而一直未能前往香港，修院工程在其缺席下於1929年中動工，建築師為Messrs. Little, Adams & Wood，承建商是Messrs. Lam Dore，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甘沛霖（Angelo Grampa）神父每天朝來夕返監管工事。然而，開工不久即遇到財政困難，負責購地<sup>38</sup>及建築費用的聖伯多祿工程處（Opera di San Pietro）<sup>39</sup>向剛恆毅和恩理覺發出預告，他們願意墊支的上限為荷蘭盾250,000元（合

---

<sup>37</sup> 聖神修院網站內「修院掠影」部分（<http://www.hss.org.hk/places.html>）的相關介紹為：「葛斯尼神父研究認識中國建築術後，設計了一個氣勢宏大的四合院式建築，上有台階一直伸向海邊，後來又改變計劃，將整座宏偉的結構，面向繁華的大路，而非孤清的海水。」

<sup>38</sup> 1928年7月30日，政府工務處（Public Works Office）通知恩主教，修院地皮的售價定為港幣6400元，界石費用為31.25元，合共6431.25元，而每年的地稅為640元。

<sup>39</sup> 聖伯多祿工程處隸屬於傳信部。根據剛恆毅在1926年6月16日致傳信部部長的信函，修院的全部費用由該處先行全部負責，再由華南各代牧區及監牧區在二十年內分期攤還一半費用，每年歸還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參見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216。

當時港幣200,000元)<sup>40</sup>。於是剛恆毅10月3日致函恩理覺說，他與葛斯尼商量後決定總修院暫時只建造第一期，其規模估計足以容納逾100人，並留下20,000美元作「修院基金」，為修院第一學年的開銷及向聖伯多祿工程處還款之用，待將來有財力再進行擴建。<sup>41</sup>

剛恆毅原希望總修院可於1930年秋季就緒，恩主教卻於1929年10月29日寫信告訴他工程必須延期，因為建造第一層所需要的方形石塊還沒有運到，承建商預計最快在1931年3月才能完成。修院終於1931年11月1日諸聖節開幕，由愛爾蘭省耶穌會士負責管理，第一批學生有20人。就現存建築物（聖神修院南樓）所見，其整體布局呈橫向伸展，牆身以混凝土、青磚和大理石築成，兩側角樓高四層，採用三重簷廡殿式屋頂，鋪以綠色琉璃瓦，並有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構件，如屋簷下的斗拱、樑柱間的雀替、屋脊上的鴟吻與翼角等。中間主樓兩層的南面均有紅色柱廊。角樓和副樓第一層的台基部分呈梯形，以一層樓高的麻石裝飾，搭配拱形大窗戶，彷彿是中國城牆與羅曼式建築的混合體，令整座建築物顯得更形堅固。

---

<sup>40</sup> 聖伯多祿工程處的荷蘭全國主任 Th. M.P. Bekkers 神父於 1929 年 7 月 5 日致函恩理覺，表示羅馬的中央議會（Central Council）方面知會他為華南總修院墊支的上限，而當時香港代牧區已經收到港幣 102,156.14 元，扣除首三年（1927-1929）到期償還的款項後，餘下的 88,100 元將於 1930 年初匯出。

<sup>41</sup> 1930 年 5 月 6 日，華南 16 個代牧區及監牧區首長在香港開會後共同致信屬下司鐸教友，鼓勵有志青年負笈行將開幕的總修院求學時，提到建築費「當逾港幣二十五萬元」。據林瑞琪的研究，各代牧區的還款情況不詳，但自 1937 年起，中國各代牧區因日本侵華戰爭而經濟一落千丈，相信大多數無力償還該筆款項。林瑞琪，〈華南總修院在福音傳播中的角色〉，頁 160。



圖一：新落成的華南總修院

(圖片來源：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ed.).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L'Art Chrétien Chinois. Numero Special. Vol.5, No.5 (May 1932), p.435.*)

## 沒有實現的中國式天主堂——聖德肋撒堂

較鮮為人知的是，位於九龍太子道的聖德肋撒堂的設計原來是中國式的，與華南總修院一樣是葛斯尼的作品。完成修院的草圖後，他應恩主教的邀請，為香港代牧區九龍半島第二座教堂進行設計，同樣是事先未能作實地考察。二十年代，由於九龍半島人口及教徒人數增長，玫瑰堂已不敷應用，教區為回應教友的需求，遂選址於九龍塘興建新堂，當時該區正在實施龐大的屋宇發展計劃，吸引了不少葡籍家庭。<sup>42</sup>

代牧區以38,250元的底價投得太子道與窩打老道交界的76,500平方英尺（約7,100平方米）地皮後，恩主教於1928年11月15日致函葛斯尼說：「我希望你這位東方的偉大建築師，迅速把這座紀念聖女小德蘭的中國式聖堂的圖則預備好。雖然我不能保證中國式的設計必定會在香港這個

---

<sup>42</sup> 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222。



大城市被人接受，但已把這個理想告訴人，並將盡力達成這個理想。」翌年1月25日，葛斯尼寄來堂區辦事處和神父宿舍的初步圖樣，但他抱怨說因為不知土地的確實面積，無法詳細描繪。一如恩主教所料，葛斯尼的中國式設計不受歡迎，於是他修改了圖則，融合其他兩位建築師A.H. Basto和M. van Wylick的構思，將聖德肋撒堂建成如今的模樣。教堂由美安建築公司承建，甘沛霖神父再次負責監督，於1931年9月動工，工程進度很快，到翌年12月8日由恩主教祝聖。<sup>43</sup>

筆者在董黎的《嶺南近代教會建築》一書找到葛斯尼的「香港九龍教堂設計圖」（圖二），來源註明為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中間是中國式大屋頂的兩層高教堂，有走廊連接兩邊的角樓，背後隱約還有一列建築物。由於角樓的樣子與華南總修院的非常相似，因此筆者對它是否聖德肋撒堂的初稿存疑，甚至不排除它就是華南總修院設計圖的可能。至於折衷後的聖德肋撒堂是混合式建築，拉丁十字型的中央有圓頂，內部採用羅曼式圓勻意念的設計，側廊以圓拱為主題，兩邊石柱則是採用科林斯式。教堂外有一幢獨立的尖塔<sup>44</sup>，唯一具中國建築特色的部分是頂樑，材料為鋼筋混凝土，包括在祭台上方呈半圓形放射型，以及中殿（nave）上方平行的數條橫樑，銜接牆壁的彎曲部分有些雕刻裝飾，為教堂增添少許中國傳統建築的韻味。

---

<sup>43</sup> 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24。

<sup>44</sup> 參考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尖沙咀、九龍塘、深水埗》（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5），頁 10-11。



圖二：香港九龍教堂設計圖

(圖片來源：董黎，《嶺南近代教會建築》，頁135。)

## 二次大戰前香港為何沒有中國式天主堂

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還出現另一座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建築物，就是興建於1935年的瑪利諾神父赤柱會院<sup>45</sup>。它也是採用中國宮殿式設計，單簷歇山頂，紅磚綠瓦，並用上中國傳統建築裝飾，屋頂上豎立了白色十字架。不過，會院與華南總修院一樣，初期僅由教會內一小群人（修生和會士）使用，而不是供一般教徒參加宗教禮儀，以及向外教人傳播福音的教堂。

據《香港天主教手冊》，除了聖德肋撒堂之外，在剛恆毅任內12年<sup>46</sup>落成的教堂有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1925年）和深水埗寶血堂（1929

---

<sup>45</sup>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創立時以向中國傳教為目標，1918年到香港，其會院位於赤柱村道一個山崗上，由在紐約執業的建築師 Henry J. McGill 所設計。大部分瑪利諾會士都在堂區和學校服務，此會院一直用作他們的退修和研習中心。美國瑪利諾神父總會於2016年決定出售該座香港一級歷史建築，會士在同年10月底遷出。參見〈瑪利諾會遷出赤柱會院 神父留港服務 建築完成八十年使命〉，《公教報》，2016年11月6日，第12-13版。

<sup>46</sup> 剛總主教於1933年返回意大利，其後出任教廷傳信部秘書長，1953年獲教宗擢升為樞機，五年後去世。

年)<sup>47</sup>。就算在1941年底日本佔領香港之前興建的另外三座教堂<sup>48</sup>，也沒有一座是中國式建築。剛恆毅在上海公議會提倡興建教堂要「因時地之宜，盡可能採用中國藝術樣式」的新傳教策略，未能在香港代牧區得到積極響應，筆者相信與香港的特殊環境有莫大關係，嘗試作淺陋的分析：

### 一、香港的政治氣候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除了開埠初年治安不靖外，本地華人對外來的基督宗教一直沒有太大抗拒。生活於華洋雜處的香港，華人對外來文化包括西方宗教及其建築抱持比較寬容的態度。在十九世紀末，傳教士在新界地區活動，興建鄉村教堂和學校，偶然會因為改變風水而受到鄉村居民的懷疑和敵視<sup>49</sup>，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仇教事件。香港代牧區在1949年以前，範圍覆蓋廣東省幾個縣。這些鄉村地區曾先後受到義和團運動、革命活動和共產主義者的迫害<sup>50</sup>。但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範圍，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相對比較穩定。教會領袖沒有感受到需要去除「洋教」形象的迫切性，因此沒有積極響應剛恆毅的指示是可以理解的。

---

<sup>47</sup> 聖瑪加利大堂是羅曼式建築。至於元洲街的寶血堂，位於一所三層高學校的底層，1956年由新成立的聖方濟各堂區接管。據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資料，寶血堂此後屬於修會所有，到1966年同學校一起被拆卸，重建為德貞女子中學的新校舍（青山道101號）。

<sup>48</sup> 這三座教堂是：荃灣聖心堂（1934年祝聖，1962年易地重建為葛達二聖堂）、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由教友捐出的小牛房改建，1934年祝聖）和九龍城聖方濟各亞西西堂（1937年祝聖，二戰期間被拆毀）。

<sup>49</sup>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頁28。

<sup>50</sup> 廣東省在二十世紀初陷入叛亂狀態，有些教堂和基督徒被洗劫，甚至有外籍傳教士遇害。到了1920年代，由共產主義者在海陸豐建立的三個試驗性蘇維埃共和政權，當地天主教團體受到不少迫害。參見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頁82-100。

## 二、香港的城市景觀

香港開埠僅一百多年，除了九龍寨城及客家圍村等傳統建築外，沒有宏偉的中國宮殿式建築，反而仿照維多利亞式或愛德華風格的殖民地建築比比皆是。在二、三十年代，源自廣州的騎樓傳入香港，成為市區華人的房屋；至於新界地區，仍是數百年不變的傳統鄉村社會型態<sup>51</sup>。因此，與中國大陸的歷史古城相比，西式教堂與香港的城市景觀尚算協調。以聖德肋撒堂為例，從四十年代的老照片可見，筆直的太子道四周的房屋是西洋式樣，西式教堂矗立於此不會顯得突兀。從恩主教在聖德肋撒堂祝聖禮上的致辭，對當年九龍面貌的變遷可知一二：「還記得若干年前，我從九龍城到深水埗的鄉村旅行時，滿眼都是山川、沼澤、溪流、中國塔；可是，像變戲法一樣，這些景物一下子便隱沒，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sup>52</sup>可想而知，在日益發展的城市裡興建中國式教堂，未必是「因時地之宜」的做法。

## 三、代牧區的財政狀況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香港代牧區的經濟艱難時期，由於受全球經濟大蕭條所波及，教會投資失利，加上聖德肋撒堂等一些建築工程正在進行，一時間現金周轉不靈，面臨破產，後來得到宗座外方傳教會借錢以

---

<sup>51</sup> 《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頁 63。書中說，香港開埠後的一百年間呈現「二元性」的發展格局，香港島西部及九龍部分地區日漸現代化，英國租借新界後基於管治上的考慮，沒有刻意改變新界鄉村的社會組織，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發展新界後，這種二元性才漸告消失。因此，教會在兩個不同社會環境裡，傳教機遇和策略以至建立起來的華人教會團體也有不同。

<sup>52</sup> 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24-225。

解燃眉之急<sup>53</sup>。在經濟緊絀的情況下，代牧區原本於1930年獲得政府在九龍城撥地建堂，但在興建聖德肋撒堂後未能馬上另外籌得款項，所以年復一年要求政府准許延長建成教堂的期限。直至1937年聖方濟各亞西西堂才落成<sup>54</sup>。由此可以想像，面對財政困難的教會，自然不會花錢去修建雕樑畫棟的教堂。華南總修院由於當時經濟不景導致資金短缺，最終無法完成全部建築計劃，相信也成為香港代牧區的前車之鑑。

#### 四、外籍教徒的影響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教區的範圍覆蓋廣東省寶安、惠州、海陸豐一帶，傳教士集中精力於發展大陸鄉間的教務。早期在殖民地範圍內的天主教徒數目不多，以外籍人士為主，中國式教堂為他們無甚意義。其中在九龍半島，人數較多及影響力較大的是葡籍教徒，玫瑰堂和聖德肋撒堂均是在他們的要求下建立<sup>55</sup>。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葛斯尼設計的中國式聖德肋撒堂，雖然恩主教喜歡，但由葡籍教徒領導的建築委員會卻不欣賞，並要求更改圖則。筆者找過的歷史資料中，沒有跡象顯示在二、三十年代有本地神父和教友曾大力要求教會本地化，或至少在建築及藝術等文化表象方面須迎合華人的形式。

#### 五、中國式建築的設計人才

前述在曾經流行於國內大城市的中國復古建築，雖是由外籍傳教士開創的，但倘若沒有二十年代留洋歸國的中國人建築師的承傳與發揚，

---

<sup>53</sup>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半山區、西營盤、跑馬地》（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6），頁 28。

<sup>54</sup>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尖沙咀、九龍塘、深水埗》，頁 21。

<sup>55</sup> 同上，頁 4；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22。

以及國民政府的文化主義本位方針，則不會出現這股體現民族性的建築潮流。在香港，受本色化神學思潮的影響，三十年代產生了一批中西合璧式基督教建築，包括沙田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34年）、聖公會銅鑼灣聖馬利亞堂（1937年）和九龍城聖三一堂（1937年第三次建堂）。除了道風山<sup>56</sup>，兩座教堂的籌建過程均由中國籍牧師主理；反觀天主教會，儘管恩理覺主教甚為欣賞中國式建築，他只能委託遠在北平的葛斯尼設計新教堂，而且在剛恆毅1933年離華後，中國式教會建築的發展也因為後繼無人而中斷，未能形成大規模、相對成熟的本地化建築形式。<sup>57</sup>

### 戰後香港的天主教建築特徵

抗日戰爭結束後短短數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建立新政權，於是由五十到七十年代，從大陸湧至的難民潮引致香港人口激增，民眾無論在物質及精神生活上皆極度貧乏，教會因而擔當提供物質支援的慈善服務及辦學角色。天主教會在難民區成立了許多中心及小堂；每年又至少有一、兩座新教堂祝聖，大部分與學校相連，有些堂區則利用天主教學校的禮堂作為彌撒中心。除了石硤尾聖方濟各堂（1955年）及華南總修院的大聖堂（1956年）比較明顯地具有中國式建築元素作為裝飾之外，其他新教堂絕大部分是較為樸素的現代主義風格。

---

<sup>56</sup> 道風山屬於基督教信義宗，其富有中國園林特色的建築群，由創辦人挪威籍宣教士艾香德牧師（Dr. 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邀請丹麥建築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Moller）設計。

<sup>57</sup> 參見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頁 518。

到梵二禮儀改革後一些天主堂也採用中國式設計<sup>58</sup>，但大多是教堂內部和祭台設置，例如祭台及司鐸輔祭座椅使用中國式的木製品、兩旁懸掛對聯，還有些司鐸在彌撒中將線香插入香爐代替奉乳香、成聖體時輔祭敲磬代替搖鈴等。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漸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事事講求經濟效益，政府鑑於每周只用一兩天的教堂，未能符合地盡其用的原則，故不再撥地給單純興建教堂之用。從此香港的新教堂便結合社區設施，如社區中心、幼稚園，甚至住宅或辦公室等元素，與社會有更多方面接觸。<sup>59</sup>

## 結論

本文概述了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1922年來華以降香港天主教建築的發展歷程，尤其集中討論由他策劃、融合中國藝術風格的華南總修院，繼而分析這種建築形式於戰前未有在香港遍地開花的原因。剛恆毅作為一位劃時代的人物，他所開拓的教會本地化之路，從中國籍天主教的產生、國籍司鐸聖召的培育、本地修道團體的創立，到建築藝術採用中國樣式，無不是他致力使在華天主教會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創舉。教會本地化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需要在每個時代不斷地進行。在建築與藝術方面，中國復古形式的黃金時代早已終結，不論在中國內地或香港，西式教堂、聖像與聖物等仍然普遍地較受歡迎，所以聖教藝術家該當思考如何不拘泥於傳統，創造屬於現代中國基督徒的聖藝樣式。與此同時，建築藝術畢竟只是宗教文化的外在形式，教會還要多花心思精

---

<sup>58</sup> 夏其龍、徐錦堯、張家興、阮美賢，《香港傳教歷史之旅——艱辛的旅程》（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9），頁39。

<sup>59</sup> 參見吳永順，〈「神的廟宇」——教堂建築〉，《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5），頁113-114。

力培育本地司鐸和教徒，使天主教神學、禮儀和信仰生活更加結合於中國文化，才是落實教會本地化的實際做法。

### 原始檔案

-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 Regional Seminary – HKCDA V-50-01

### 參考書目

- 田英傑 (Ticozzi Sergio) 編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
- 林瑞琪。〈剛恆毅與一九二四年上海會議的國籍教長〉，《鼎》，2008年春季號，第28卷，第148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頁23-38。
- 林瑞琪。《近代天主教在華傳播史論集》（第二版），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12。
- 柯毅霖 (Gianni Criveller)。《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
- 剛恆毅 (Celso Costantini)。《維護宗教藝術》，台北：天主教主徒會，1977。
- 剛恆毅等著，孫茂學譯。《中國天主教美術》，台北：光啟出版社，1968。



- 夏其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尖沙咀、九龍塘、深水埗》，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5。
- 夏其龍、徐錦堯、張家興、阮美賢。《香港傳教歷史之旅——艱辛的旅程》，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2009。
- 陳翠兒、蔡宏興主編，香港建築師學會統籌。《空間之旅：香港建築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5。
- 陶飛亞。〈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5期，頁114-136。
- 華南聖神修院鑽禧慶典籌備委員會。《華南聖神修院鑽禧紀念特刊》，香港：聖神修院，1992。
- 聖教雜誌社編。《聖教雜誌》中華全國主教公會專號，上海：聖教雜誌社，1924年7月。
- 董黎。《中國教會大學建築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董黎。《嶺南近代教會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
- 趙天恩編。《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香港：中國教會研究中心，1983。
- 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劉紹麟。《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3。
- 賴德霖。《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 鍾定舟。〈剛恆毅樞機與華南總修院〉，《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銀慶特刊），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99-100。

-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ed.).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L'Art Chrétien Chinois. Numero Special. Vol.5, No.5 (May 1932). Beijing: Commissio Synodalis in Sinis.
- Cheung, Ka-wing Fredo.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a Church: The Heritage Cluster of St. Teresa's Church, Kowloon Tong* (Thesis, Master of Science in Conservation).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 Fukushima, Ayako. "Catholic laity involvement in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urch building projects in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from the 1960s to present."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Science*, No.667 (September 2011), pp.1711-9.

[ABSTRACT] Under the decision on the inculturation of sacred art of the first Synod of Bishops in China (1924), Catholic building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were built sporadically around China. However, the Hong Kong Catholic Mission seemed to be unconcerned: St. Teresa's Church in Kowloon dropped its Chinese-style design because the Portuguese parishioners objected; and Regional Seminary in Aberdeen, the first Chinese-style Catholic building, could only complete one third of its massive compound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funds.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in and outside the Church, this essay first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style Catholic architecture and the views of two people at the office of the Papal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Celso Costantini and Dom Adelbert Gresnigt, who were invited by Costantini to design Chinese churches. Second, we conduct a study of the aforesaid two buildings in Hong Kong and discuss why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inculturation was slow before World War II (1941) in light of the British colony's unique history and landscape, finances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and the demand of local parishioners, among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essay looks briefly into a trend for new churches at the time to emphasize function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a switch in thinking of the local Church in light of its social role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After the close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5), Chines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were readopted in some churches in response to the council's imperative on liturgical inculturation.

**Keywords:** Catholic architecture, Celso Costantini, inculturation, Regional Seminary for South China, sacred art, St. Teresa's Church